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转型的机制、困境与进路

梁舒乔¹ 訾扬州²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2.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在人口结构、教育政策以及产业升级的多样背景下, 我国民办本科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正面临转型挑战, 该核心困境源于“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与“育人为本”的价值理性二者之间失衡, 依托于韦伯的理性二分法, 结合哈贝马斯、诺丁斯再加上麦金泰尔的理论, 搭建哲学—伦理学的分析框架, 系统挖掘工具理性驱动转型的外在逻辑和内在的局限, 展现其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承认正义与教师德性实践当中的伦理困境。提出应运用沟通理性重塑治理架构, 运用补偿正义优化制度内容, 经由关怀伦理重构课程与师生关系, 培育“反思性实践相关的工作者”, 进而助力学前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及社会公平使命。

关键词: 民办本科; 学前教育; 专业转型

基金项目: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校级课题—学校相关专业的一般研究课题“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转型发展的机制研究”(SD-YB202504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0.1552

一、生存压力与价值迷失：转型时代的现实机制

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进程与人口结构的历史性变迁, 把民办本科高校推到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关键转折点, 以应用型、市场化专长著称的学前教育专业, 第一个冲上去应对变迁, 生源一直缩减、国家对学前教育师资培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以及社会对优质普惠学前教育的急切期盼, 共同描绘出一幅繁杂又严峻的图景。随着“全面三孩”政策效应渐渐消退[1], 新生儿数量一直走低, 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呈现出结构性的数量规模下降, 直接冲击秉持规模扩张传统生存逻辑的民办高校, 国家政策层面不断提高学前教育师资准入的标准以及培养质量要求, 恰似《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正式开展实施, 进一步拉高了民办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压力。新时代家长对学前教育的期望不再只局限于“看护”和“启蒙”这两点, 而是寻觅更科学、体现个性且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服务, 这也为学前教育人才培养设定了更高的要求。

鉴于这样的背景, “转型”已成为民办本科学前教育专业寻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与核心要点, 纵观现今的转型实践尝试, 多数讨论都集中到操作层面, 诸如课程模块的增减变动、实践学时的延长安排、校企合作的拓展举措等, 这些探讨实际上有现实意义, 却大多仅停留在技术与策略层级, 欠缺对转型自身价值前提及伦理后果的反思[2]。实际实践时常见的“转型”往往演变成一种应激反应, 好似盲目开设“热门”方向课程、追求就业率的表象提升, 或是过度迁就市场的短期需求, 无视教育内在规律及学生长远规划, 若仅仅把转型理解为应对危机的“技术调整”或“市场策略”, 就容易陷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醒过的“工具理性”铁笼(iron cage)里——也就是为了达成生存和效率的目的, 进而在无意识间牺牲掉教育的终极价值与人的意义。

民办本科层面学前教育专业的转型, 首先必须是一番价值的廓清与哲学的叩问, 迫切要回应: 转型的终极目

作者简介: 梁舒乔(1999—), 女, 硕士,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文法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社会学;

訾扬州(1998—), 男,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通讯作者: 訾扬州

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大学的财务报表收支，还是为了教育本身的美好？是为了高效地造就“标准化”教师[3]，还是为了培育怀有爱心、正义感与反思能力的“完整个体”？这些问题的答案和结论，任何技术方案都远远无法给出，亟需回到教育哲学与伦理学的范畴，去查找方向的指引。超越单纯的教育学论辩，引入一套跨学科的“哲学—伦理学”分析架构，采用韦伯提出的理性二分法，批判地审视转型动因是怎样被工具理性所“僭越”的；依靠罗尔斯、弗雷泽的正义理论以及诺丁斯、麦金泰尔的伦理学主张，深度分析转型进程中显现的正义与伦理的困境；试图搭建一个以“价值理性”为引领，以“沟通行动”当作办法，把“关怀关系”及“实践智慧”作为实践路线的转型策略，以期为民间本科的学前教育专业后续发展，供给一种拥有伦理高度与哲学深度的理论指引。

二、效率至上何以僭越育人本位？——工具理性的批判视角

民办本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碰到的转型压力，从直观层面讲，源自生源、政策与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变迁[4]，然而它的深层动力机制展现出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的扩张和价值理性 (Value Rationality) 的衰微，对这一动因进行哲学层面的批判，是理解一切后续困境的逻辑起点[5]。

工具理性是一种突出手段有效性及行动效率的思维类型，谋求以最小代价得到最大收益的思维样式，在民办高校开展转型决策的阶段，这种逻辑展现得一览无余，出生率走低首先被解读成“生源市场”的萎缩，生源就等同于财源；国家推出的各类标准被当作必须实现的“严格约束”和“进入市场”的门槛；所谓“错位竞争”策略往往会把目光投向支付能力更强的细分市场。这种工具理性的驱动，在组织的生存层面存在现实合理性，但它把教育这一培养人的复杂事儿，简化为一种能计量、可预测的“生产—消费”进程，专业、教师、学生在整个生产流程里都被“物化”为“资源”与“产品”，教育过程被量化成诸如就业率、考证通过率、项目经费等指标，教育的丰富层面和人文意蕴被极大压缩。与工具理性形成对照，价值理性相信行为本身存在价值与意义，而不是聚焦于其达成的结果，它留意着“是否应当是这般情形”的终极性问题，学前教育的价值理性内涵，起始于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核心使命：它不只是聚焦于技能的传授，更在于为孩子一辈子的“善好生活”夯实基础，照看其好奇、天真与创造能力；它本质上内含着一种伦理责任，即为社会培养促进教育公平的实践人员，降低社会不平等水平；就学生而言，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成为饱含同情心、正义感、批判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完整的人”，而不只是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人力资本”。好比杜威所言，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就是个人成长，其根本目的不是达成那些外在的功利目标，而在于达成个人的内在价值与构建美好生活，现阶段转型的深层矛盾在于，引导转型的是工具理性的效率逻辑，而衡量转型是否成功的终极准则，却是价值理性的实现程度。这种“动力”跟“目的”之间的脱节与错离，是致使后续一连串伦理困境的关键源头，民办高校的转型过渡，若无法率先达成从被动适应工具理性到主动探究价值理性的“哲学观转向”，则所有技术层面的改善都可能是舍本逐末之举，只有依靠价值理性的指引，转型才会真正回归到教育本质，实现育人该承担的使命。

三、主体性遮蔽与正义性缺失：转型中的多维伦理困境

由强大的工具理性所主导，转型的具体实践活动在治理、资源分配、课程以及师生关系等多个范畴，都面临了棘手的伦理难关，突出体现为正义性的不足与主体性的遮蔽。

站在资源分配的维度上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主张资源要向“最不利者”倾斜，以最大程度地让最不利者的处境变好，体现差别原则当中的补偿正义，可现实却是，民办高校在财政支持、师资配置、生源质量等方面，相较于公办院校呈现出结构性弱势。政府财政投入主要是往公办高校流动，民办高校的收入大多依赖学费，资金来源单一，稳定性欠佳；师资队伍内高层次人才占比偏低，教师出现较大程度的流动，科研及教学投入的力度不足；录取分数线一般比公办院校低，生源基础高低错落，这种起始阶段的不公正，让民办专业转型在资源限制的困境中难以前行，不能保障其学生享有同等水平的教育条件，加剧了高等教育体系里的马太效应，与教育公平的伦理原则相悖。

从治理参与的维度考量，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着重提出借助主体间的真诚交流来达成共识[6]，打造一个依靠理性沟通的民主决策进程，但现阶段的转型决策多是由上级下达的行政命令，学生、教师乃至未来即将服务的儿童作为核心利益关联对象，其声音、需求与体验老是被置于边缘位置，成为缄默的“边缘人”。转型方案的设计一般由行政管理人员掌管，缺少一线教师、学生代表及用人单位的实质性融入，这种对“他者”主体属性的漠视与遮隐，与列维纳斯所强调的“他者”伦理学相悖，也就是说伦理的根源是对“他者”面孔的回应与责

任,只要教育转型失去多元主体参与和对话,就容易与真实需求产生偏差,成为少数人意志的现实反映。

在承认正义的维度层面看,南茜·弗雷泽称,正义不仅囊括资源的再分配,还涵盖文化层面的承认以及制度方面的代表权,民办学前教育专业及其师生老是被贴上“分数低”“基础差”“商业化”等标签,对此类符号化的贬低和错误认知形成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创伤,损伤了他们在职业上的认同与尊严,社会对民办教育的歧视、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看轻,以及内部管理当中重使用而轻培养的趋向,都造成师生难以获取应有的尊重与认可,弱化其专业自信以及归属感[7]。

从考量教师发展的维度看,转型过度聚焦对教师进行技能化、标准化的“培训”,却无视了对教师作为道德主体的“培育”事宜,在工具理性的驱动情形下,教师发展项目往往把重点放在教学技能、信息技术应用、项目申报等可量化能力的提升上,却忽略了教师教育信念、伦理意识、批判反思能力等内在素养的培育[8]。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着重强调的“实践智慧”(phronesis),也就是在复杂状况下做出明智判断与道德抉择的能力,其培养空间正不断缩小,这让教师在复杂的教育情形里难以进行创造性的实践探索,其工作陷入“去技能化”与“去道德化”境地,最终削弱了其职业的神圣感与内在价值,陷入麦金泰尔提及的“德性实践”空荒困境。

四、走向关怀共同体与反思性实践者:价值重构的实践进路

试图突破上述困局,肯定要进行一场深刻价值观引领着的范式变革,把价值理性再度摆到中心区域,这说明需要一套融合哲学智慧及伦理关怀的系统性方式。

从治理这个层面,应汲取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与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形成一种关系性的治理模式,决策者得跳出“控制-服从”的怪圈,过渡到一种“感知-回应”的关怀关联,设立包含政府、高校、幼儿园、社区、学生及其父母的“关怀共同体”,采用常态化的对话途径与民主协商进程,诸如转型听证会、师生专题座谈会、校企合作理事会议事等,保障所有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声音能被听取,切实推动决策调整,治理过程须呈现公开透明,决策依据要充分展现多元主体的利益与价值诉求,使治理成为一种落实程序正义与承认正义的伦理实践方式。

就制度与资源层面而言,必须切实贯彻罗尔斯的补偿正义原则,国家教育政策应丢掉“一刀切”的评估模式,认识到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在起点方面的差别,为私立高校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转型扶持资金、师资培训安排,而且在质量评估当中纳入其服务区域经济、吸纳多种生源、增进教育起点公平等特色化贡献指标。可设立针对民办教育发展的专项基金,支持民办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开展课程革新、推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提升教师科研水平;给评估指标添加“教育公平贡献度”“区域服务满意度”等质性评价维度,指引民办高校走特色与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在专业内部范畴,资源分配应当果断地朝内隐且关乎长远发展的“质量建设”倾斜,如支持教师开展与行动相关的研究、建设高质量实习据点、开发特色课程模块单元等,而不只是把资源投入到外显且可量化的指标。

在课程及教学范畴开展一场以“实践智慧”培育为核心的改进,课程重构应把培养师生的“实践智慧”作为目标[9],教学内容应当超出技术性知识范畴,大量引入涉及伦理决策、价值辨析的案例教学及项目学习,开设“学前教育伦理专题”“儿童权利与教育正义”之类的模块,引导学生聚焦教育中的伦理问题;采用服务学习、参与式行动研究等途径,把教学区域从课堂扩展到真实的幼儿园情形,鼓励师生针对复杂的、“境遇性的”实践问题开展合作探究与反思性对话[10]。教学评价同样应从强调知识记忆转向关注批判思维、伦理敏感性与实践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教师得以从知识的机械传导者转变为凭借德行引领学生成长的“人师”,学生则会成长为不光“明白”怎样做,更知晓行动动机、饱含责任担当与关怀情怀的反思性实践者,由此真正实现学前教育专业从培养“技师”迈向培育“仁师”的显著转变。

结语

民办本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转型,归根到底是一场价值的对抗与哲学的转向,这并非一次专业的调整,而是一次再度探究教育本质、再次定位专业使命的实践,倘若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及其引发的伦理风险,转型很有概率在效率至上的误区里越走越偏,最终跟教育的核心价值背道越远。未来的实践路径在于,毅然打破“铁笼”的枷锁,靠沟通理性再度塑造共识,以关怀伦理达成人心凝聚,靠正义原则调理秩序,最后靠实践智慧为师生赋予力量,只有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递进,民办学前教育专业才会在这场大考里真正实现根本性蜕变,从被动抵御生存困境的“适应者”,成为主动开创未来教育新局面的“开创者”,在国内

教育的整体架构里，觅得它不可替代的伦理价值与尊严的落脚点，切实扛起教育强国的伟大使命。

参考文献:

- [1] 钱雨. “全面三孩”政策下我国学前教育福利的转型[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 (05): 20-28.
- [2] 高书国.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转型研究: 从快速成长到规范发展[J]. 教育科学研究, 2019, (06): 5-9+16.
- [3] 张炜. 教师职前培养质量标准化评价的定位及差异性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 2015, (08): 56-63.
- [4] 姜勇, 郑楚楚. 汇聚与变革: 改革开放 40 年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历程解析[J]. 学前教育研究, 2019, (03): 31-40.
- [5] 严仲连, 郭志辉.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风险及防范[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 (12): 66-71.
- [6] 尹新瑞, 吴帆. 文化遗产与沟通行动理论: 和谐代际关系建构的理论视角与方略[J]. 湖南社会科学, 2019, (05): 53-60.
- [7] 王嵩迪, 文雯. 从分配正义到承认正义: 高校专项计划生的教育经历研究[J]. 现代大学教育, 2023, 39(03): 79-86.
- [8] 丁俞文, 陆彬蔚, 许锋华. 有限理性的冲突与协调: 学前教育师范生从教意愿的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25, 37(03): 93-100.
- [9] 王萍, 张帆, 王炜楠. 国外学前教育本科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2): 64-73.
- [10] 张斌, 虞永平. 守正与创新: 指向中国式学前教育现代化的幼儿园课程改革[J]. 学前教育研究, 2023, (06): 11-19.

(Fro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Value Rationality" : The Mechanism, Predicament and Approach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Undergraduat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ShuqiaoLiang¹, YangzhouZi²

¹ Zhengzhou Shengda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Management, Zhengzhou, China

²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iverse background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China's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facing transformation challenges. The core predicament stems from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efficiency first"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people-oriented". Relying on Weber's rational dichotomy and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Habermas, Nordines and McIntyre,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external logic and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veal its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practic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recognition of justice and the virtue of teacher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should be reshaped by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the institutional content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ompensatory justice, the curriculum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caring ethics, and "workers related to reflective practice" should be cultivated, thereby helping preschool education return to its essence of nurturing people and the mission of social equity.

Keywords: Privat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